

再论程秘《洛水集》的版本源流

徐 阳

内容摘要:程秘《洛水集》是南宋中后期的一部重要别集,现有研究对其文献源流的认识尚有不足,诸多关键环节未得揭示。就宋元时期的编刻而言,是书在程秘生前编集后,至少经历了宋末初刊与元初重辑再刊。关于该书现存版本,公认为善本的嘉靖刊本尚有鲜为人知的初印本,保留了后印本不存的分工录刻者题名与内文漫漶文字。向为学者忽视的北大藏清抄本来源于初印本,而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崇祯本当渊源于后印本。至于前人所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校勘“优点”,实则并无其他版本依据,皆为理校,存在误读妄改。

关键词:程秘 《洛水集》 宋集编刻 版本源流

引言

程秘(1164-1242)字怀古,徽州休宁人,因祖籍河北洛水,又号洛水遗民。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著有《洛水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本文统称三者为“程秘文集”),其中内外制《类稿》全帙已亡。现存刊本有《程端明公洛水集》嘉靖刊二十六卷本(以下简称“嘉靖本”)、崇祯刊三十卷本(以下简称“崇祯本”)两种,后者又成为《四库全书》本的底本。程秘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亲历宋金战事,对南宋国防、军政见识深刻。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崩,他为丞相史弥远夜召同入禁中草诏,参与矫立理宗,与南宋中后期政局关系紧密。程氏晚年归老休宁,还留下了不少有关徽州地方的记载^①。在现存

^①关于程秘生平,参见黄宽重:《程秘与〈洛水集〉研究》第二节《程秘年谱》,收入《南宋史研究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92-140页;王宏生:《程秘传》,傅璇琮、程章灿主编:《宋才子传笺证》,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111-135页。

史料相对零散的南宋中后期,被认为“立朝以经济自任”^①的程秘所著《洺水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因此素为学者留意。学界围绕该书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学研究,或侧重于著录现存版本与比较篇目多寡,或聚焦于文渊阁四库本的得失与驳斥《四库全书总目》旧说^②,然而在重新检视材料之后,笔者发现该书的文献源流仍有若干重要节点不甚清晰,值得继续讨论。

就《洺水集》在宋元时期的编刻而言,前人往往局限于简单转述程秘传记与两种明代刊本的序跋与附录文字,较少利用其他文献中有关此书的记载。不少关键问题,例如程秘生前是否编集、刊行文集,宋元两代刊刻的次数与相关史事等,都存在待发之覆。

而在该书现存版本方面,至少有四个疑点尚待解决。其一,嘉靖本历来被视为善本^③,但现存大多数印本的卷端每每可见剗去录刻人题名的痕迹,内文亦有漫漶不清处^④。这种现象不禁令人疑问,是否存在一种保留题名且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集部·别集类·洺水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5页。

②关于本书最早的版本学研究,当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为嘉靖本《洺水集》所撰写的提要,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三十卷崇祯本较原六十卷本《洺水集》“旧阙其半”的说法并不成立,的为确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2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黄宽重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洺水集》的研究,比较各本篇目多寡,揭示了文渊阁四库本篡改的痕迹,指出宋集版本考订对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堪称典范(参见王重民:《四库全书本〈洺水集〉补遗——程秘及〈洺水集〉研究之一》,《书目季刊》1974年第2期;《四库全书本得失的检讨:以程秘的〈洺水集〉为例》,《汉学研究》1984年第1期;后修订汇总诸文为《程秘与〈洺水集〉研究》,收入《南宋史研究集》,第140-183页)。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中也简要著录了《洺水集》的明代刊本,并对《四库全书总目》有所辨正(王重民:《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卷二四,中华书局,2019年,第1237-1241页)。

③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532页。黄宽重:《程秘与〈洺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0-183页。

④综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可知该本国内凡8家单位收藏,海外3家,其中笔者核验的这类有清除痕迹的印本共7部,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3部,索书号:09069、03716、07698;南京图书馆1部(索书号:111332),本文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丁丙藏本胶卷S0497;上海图书馆2部,索书号:线普406859-64、线善780374-85,上图藏本均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飞代为查阅;首都图书馆藏1部,索书号:丙四4315。

文字更完整的嘉靖初印本^①实物?该问题关系到《洛水集》现存最重要刊本的原始面貌,但迄今未得追踪验证。其二,王重民先生曾提出嘉靖本“即崇祯本所从出”^②,然而该说法并无序跋等文献记载印证,或限于篇幅,王先生也未继续加以讨论。这一重要判断至今仍缺乏详细论证,直接影响了对《洛水集》现存两种明代版本关系的认识。其三,在版本调查上,《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早已著录了一种北京大学藏《洛水集》抄本,关于该本的情况及其与现存明代刊本的关系,目前尚无研究^③。其四,有学者认为文渊阁四库本《洛水集》除了避忌删窜之外,还存在校勘优于明刊本的文字,推测是因为参考了不少其他版本^④。这一推论关涉到《洛水集》四库各阁本的源流,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然成立与否尚需辨正。

总而言之,该书在宋元时期的编刻过程及现存版本关系等问题都有待重审。本文拟细致解读前人分析不足的序跋、附录材料,充分调动其他文献记载,广泛搜罗、比勘现存版本及其先后印本,试图综合考察《洛水集》的版本源流,以期推进学界对这部南宋中后期重要文集的文献学认识^⑤。

一、宋元两代程秘文集的编刻

黄宽重认为程秘《宋史》本传、行状、墓志都作“《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行于世”,推测该书在宋代或已刊行,至少由程秘编定;又根据嘉靖本《洛水集》附录程钜夫《赠梅亭刻洛水集序》指出是集到元代已多佚散,乃由程秘曾孙景山重刊^⑥。祝尚书则依据嘉靖本所附程元

①初印本与后印本是相对概念,从外观形式看,版片雕成后字迹清晰无损的正式刷印本称初印本,之后反复刷印,书版受损,称后印本。从文字内容着眼,正式刷印后未改动文字的印本称初印本,之后刷印改动文字的称后印本。以上定义参见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通论实例编》,中西书局,2015年,第66页。

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532页。

③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第283页。另外,《中国古籍总目》提到南京图书馆还收藏有一部清抄本,经笔者查询《南京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以及致电该馆询问,南图实际并不存在这部抄本,《中国古籍总目》或有误(《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1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362页;《南京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364页)。

④黄宽重:《程秘与〈洛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57页。

⑤本文不讨论程秘作品的后代选本《洛水词》。

⑥黄宽重:《程秘与〈洛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1-142页。

晒《后序》认为景山乃“初刊其集”^①。可见前人研究对程秘文集结集与刊刻的关键节点仍有争议。本节将重新辨析既有核心史料,同时调动其他相关文献,梳理程秘文集在宋元时期编刻的基本过程,并对元代景山刊刻一事的发起缘由及参与人员提出新的见解。

(一)程秘生前其文集之编集

前人讨论程秘文集的编刻多据程氏传记与明代刊本所附序跋等文字而论,其实程秘同时人岳珂已留下了一条关键记载。《鄂国金佗续编》收录了程秘撰写的岳飞改谥忠穆制,岳珂在其后题跋云:

右札词,翰林学士程公秘所拟撰也。先王初被宝庆乙酉诏书,实先赐谥忠穆。时程公以刑部尚书与今吏部侍郎王公暨对掌纶掖,始聆听庭之旨,跃然喜曰:“此圣上初政大庆赏,足以慰天下公议矣!”退即拟制,以俟录黄之下。继而宸衷未愜,犹曰:“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画旨至中书,适王公当视草,遂盼今制。继而程公以书来曰:“某甚愿附名英烈,而词头适不相值。念具稿已成,虽不得敬宣德意,而快睹之初心,不可不著见。已置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闻将嗣《金佗》之编,幸并传以示来世。”因录以寄。^②

上文提及宝庆元年(1225)岳飞改谥,先谥忠穆,后改为忠武。据《宋史全文》可知初改谥忠穆在宝庆元年二月^③。而这份改谥外制制词,正是权刑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程秘所撰^④。程氏行词完成,制书进入录黄阶段后,理宗复决定再改谥岳飞忠武,画旨至中书时,适逢另一位外制王暨当值,程秘遂失去撰写岳飞改谥忠武外制制词的机会,原撰制词亦成废稿。尔后,程秘听闻岳珂正在编纂《鄂国金佗续编》,“甚愿附名英烈”,遂将废稿寄去,岳珂因而识之,以记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程秘在致函岳珂时,提及他已经将改谥制词废稿“置所

①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卷二四,第1238页。

②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十六《天定别录》卷四《附录》,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1494页。

③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2619页。

④程秘宝庆二年十月方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岳珂称程氏为翰林学士乃以后官概称(参见吕午:《宋故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赠特进少师程公行状》,《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二五《附录》,嘉靖本,叶九至十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069。后文引嘉靖本如未特殊注明,均为此印本)。

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岳珂《天定别录》撰成于绍定元年(1228)^①,可知不晚于此年,程秘已经着手编纂所撰外制制词。吕午淳祐三年(1243)十月撰《宋故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赠特进少师程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著录有“《洺水先生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②。该文据程秘之卒仅一年有馀,又未提及他人编录遗文,可见程氏生前应已大致编定上述诸书。程秘致函岳珂所谓“所集外制”,当即后来的《外制类稿》^③。另外,根据程氏履历也可约略推论其文集编定时间。据《行状》,程秘因身兼两制,于宝庆元年十月,力辞西掖(即外制),得请,仍兼直学士院,宝庆二年十月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自绍定元年三月出知宁国府后,再未担任两制撰写制词。至绍定三年三月奉祠后,即长期乡居^④。由此可知,程秘《内制类稿》的最后编定应不会早于绍定元年。至于六十卷《洺水先生文集》后来构成了今本《洺水集》的主体内容(说详后),其中载有不少程秘老年乡居之作,编定时间应当最晚^⑤。

关于程秘文集在宋代的刊刻问题,黄宽重曾依据程秘《宋史》本传、行状、墓志都作“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行于世”,推测宋代程秘全集或已刊行^⑥。实则《宋史》本传并未记载程秘文集的任何情况^⑦,仅就所据吕午撰《行状》与同年十一月间程秘子若愚撰《宋故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少师程公墓志》(以下简称“《墓志》”)而论,二者涉及程秘文集的记载也不完全一致:

有《洺水先生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藏于家。^⑧(《行状》)

学者尊称之曰洺水先生,有《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

①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十三《天定别录序》,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第1426页。

②吕午:《行状》,《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五《附录》,嘉靖本,叶十五。

③《外制类稿》今已亡佚,程秘撰岳飞改谥忠穆制又见嘉靖本《洺水集》卷首,为程氏后裔辑自《新安文献志》者(详后),并无“表事”之文。

④吕午:《行状》,《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五《附录》,嘉靖本,叶十三。

⑤例如程秘《休宁县重建大成殿记》提及“告成于淳祐壬寅孟夏”,两个月后程氏去世(见《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九,嘉靖本,叶六)。

⑥黄宽重:《程秘与〈洺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1页。

⑦脱脱:《宋史》卷四二二《程秘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616-12617页。

⑧吕午:《行状》,《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五《附录》,嘉靖本,叶十五。

制类稿》二十卷,行于世。^①(《墓志》)

《行状》记载程秘文集“藏于家”,《墓志》则记载“行于世”。其实仅仅依据后者,并不能直接推测文集已经刊刻行世。从理宗朝成书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可见,大约同时的陈振孙藏书仍然呈现抄本与刻本杂糅的面貌,抄录仍然是书籍“行于世”的重要途径^②。而吕午撰《行状》与程若庸撰《墓志》都在淳祐三年,据吕氏称:“前期若愚书来曰:‘先公生平出处,相知深,相与厚,莫若子。敢以《行实》一编丐定,次将告诸大史氏,以信今传后’。”^③是吕午乃受程若愚请托而撰写《行状》。倘多达九十卷的文集已经刊刻而成,吕午恐怕不会仅以“藏于家”三字轻轻带过。总而言之,程秘在生前已将个人文字编纂为文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但直至其去世一年余,其集应仍未刊刻。

(二)程秘身后其文集在宋元时期的刊刻

黄宽重讨论程秘文集刊行于元代的核心文献是嘉靖本《洛水集》附录至元二十八年(1291)程钜夫《赠梅亭刻洛水集序》。其实程钜夫此序已见于时代更早的《〔弘治〕休宁志》中。两处文字不尽相同,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程秘文集编刻过程的认识。《〔弘治〕休宁志》引此文题作《送程梅亭序》(以下简称“《送序》”):

长读书临汝,侍洛水犹子徽庵先生,道洛水尤详……然徽庵《太极图》(所)说《近思录》[注]《字训讲义》等作,余诸父暨余概童而习之,独洛水文集不多见。徽庵每教余作大文字,盍归求之洛水。及余索余稿,徽庵亦茫然无从得,叹曰:“既镂而幽之矣”。时口授数十首,余把笔识之,终宋季不及见其全。^④

程钜夫在《送序》中首先回忆了他读书临汝书院,从学程秘侄辈徽庵程若庸时,欲求程秘文集而不得的景况。在此期间,程若庸尽管每每以程秘所撰制诰“大文字”为楷模,但手头也没有程秘文集,不得不对程钜夫感叹此书“既

①程若愚:《宋故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少师程公墓志》,《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二六《附录》,嘉靖本,叶四。

②马楠:《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原载《文史》2017年第3期,收入《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中西书局,2020年,第115-116页。

③吕午:《行状》,《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二五《附录》,嘉靖本,叶十六。

④程敏政编辑,欧阳旦增辑,张镔重校:《〔弘治〕休宁志》卷三二上《附文·人物序·送程梅亭序》,《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82-683页;又据《〔弘治〕休宁志》卷七《书目一》(第496页)、卷九《人物二·程若庸》(第513页)校正部分文字。

镂而幽之矣”。此句嘉靖本《洺水集》附录《赠梅亭刻洺水集序》作“既缕而幽之矣”^①，文义不通，当从刊刻时代更早的《〔弘治〕休宁志》作“镂”，即镂刻雕版之义。可见程若庸在教授程钜夫前，已知程秘文集曾经刊刻。据程钜夫诸孙程世京至正二十七年（1367）撰程钜夫《年谱》记载，程钜夫从学程若庸于临汝书院，始于咸淳三年（1267）十九岁时^②。而咸淳四年程若庸即离开抚州，就任武夷书院山长^③。据此可知，程若庸记忆中程秘文集的刊刻必早在咸淳三年之前。咸淳三年上距程秘逝世间隔二十六年，距吕午撰写《行状》二十五年，此期间刊刻的程秘文集，应当就是据家藏稿本刊印的初刻本。

这部初刻本未见著录。据程钜夫在《送序》中回忆，程若庸的著作“余诸父暨余概童而习之”，然而彼时程秘文集却“不多见”。直到咸淳三年程钜夫游学临汝书院后，他才从其师程若庸口中得知程秘文集曾经刊刻，但只得笔录其师“口授数十首”，终宋季都未见原书。程若庸、程钜夫作为程氏族人亦难以得见此书，可知程秘文集之初刻本流传范围并不广。

至元十五年（1278），程钜夫终于获得了一部《洺水集》刊本。他在《送序》中又记载称：

至元十有五年，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肠枯血指，瑟缩不敢书。余徐悟徽庵畴昔令余学洺水类前知者。一日尽得《洺水集》若干卷读之，浑厚悠长，明白正大，盖其曾孙景山收拾残文断墨于名山大川，摹刻与天下士共之有日矣。今年春，坐行御史台，有通州教授程君入谒，问其乡曰新安，问其族曰内翰曾孙，尝编注其文集者。於乎，余违临汝十年，而始得见洺水之曾孙。使来见也无所挟，余将张之，况文与理不失其世守，年少而志锐。惜乎，余于洺水无能为役，而其言不足见信于世也。为书平日所睹闻于先祖、于徽庵叔祖者以勉之。至元二十八年龙集辛卯七月望日，族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侍御史、行江南诸道御史台事文海敬书。^④

序中记载这部《洺水集》乃程秘曾孙景山“收拾残文断墨于名山大川”，是此本乃重辑而成，并非初刊。德祐二年（1276）宋元鼎革之际，程秘后裔世代所居的徽州休宁县曾遭兵燹，有可能是这次动荡使得宋末初刊不久的程秘文

①《〔弘治〕休宁志》卷三二上《附文·人物序·送程梅亭序》，第683页。

②程世京：《年谱》，《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首，《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叶二。

③《〔弘治〕休宁志》卷九《人物二·程若庸》，第513页。

④《〔弘治〕休宁志》卷三二上《附文·人物序·送程梅亭序》，第683页。

集经历散佚^①。至于重辑本的具体刊刻时间,由于文献不足难以考实,仅知必不晚于程钜夫得书之时。程钜夫于至元二十八年《送序》自称十五年初入翰林时,尚未得见程秘文集,待“一日尽得《洛水集》若干卷读之”,方知此书“摹刻与天下士共之有日矣”。至元十五年前后宋元战争仍较激烈,休宁方经战乱,刻书困难不小,而此时程钜夫远在北方,访书亦非易事,《送序》所谓“一日尽得”云云恐怕很难发生在至元十五年。待南方逐渐稳定,程钜夫始于至元二十三年任行御史台事奉诏“搜贤江南”^②,因此他亲见《洛水集》应当在重回江南之后^③。此程钜夫所见之重辑本今亦亡佚,且未见书目著录,仅有文集六十卷还是也包括内外制《类稿》,已不可考。关于此书的体例,程钜夫提及程景山“尝编注其文集”,推测书中可能还添加了编辑者的注释。

关于这部重辑本的编刻者,程钜夫中仅提及程秘曾孙程景山,黄宽重进而依据成化中《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以下简称“《世谱》”)考订程岷字景山号梅亭^④。然细究《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似乎当时参与编刻《洛水集》重辑本者尚有其人。

《世谱》卷四称程秘曾孙岷(父其仁,祖若愚)“字景山,号梅亭,元通州教授。尝诣雪楼,有序赠别”,并未记载他参与编刻文集事。而同卷却称程秘有另一位曾孙岷(父其深,祖若水)“尝编《洛水集》钁梓”^⑤。

据《送序》,程钜夫在至元二十八年曾亲见程景山,并记载他入元后曾任通州教授并参与编刻《洛水集》,未提及程景山名“岷”抑或“岷”。而比勘成

①此事散见诸书,以明人程敏政的叙述较为简明集中:“按宋德祐丙子,徽州招讨使李钜节制徽州军马,王积翁以徽州降元,以元招降榜文发休宁晓谕。副都统李世达不肯署降,与钜之子汉英率所部迎战,时谪官朱颖达权知县事。由是休宁义士亦各起兵应世达。六月,元万户李术鲁敬以兵破昱岭关,下徽州。世达众寡不敌,道休宁西走行在。元军下令屠徽州歙、休二县,歙人郑安,休宁人赵象元、程隆,各捐家赀,冒白刃往说之乃止。”(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三七《书先县尉公所受至元敕牒后》,《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叶六)程敏政所述乃参订撮要“诸书及家传之类”,大体无误。徽州歙县人方回《先君事状》也记载称“徽州李世达之变,家藏书数万卷一空”(方回:《桐江集》卷八《先君事状》,《宛委别藏》第10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0页)。

②揭傒斯:《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雪楼先生程公行状》,《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附录,叶三。

③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老师提示。

④黄宽重:《程秘与〈洛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1页。

⑤《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成化刊本(索书号:911064-65),叶一。

化间《世谱》中的程岷小传,可知其内容当参考自程钜夫《送序》。《世谱》既以程岷字景山号梅亭,却不载其编刻文集事,反而在程岷小传下记载他“尝编《洺水集》钁梓”,应当是别有依据。盖《世谱》编者倘不知当日何人参与再刻《洺水集》,既见程钜夫《送序》知有“景山梅亭”一人而已,何必在比定程岷即景山后,又将编刻文集事另系于程岷名下?可见在《世谱》与《送序》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判断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程岷、程岷,甚至或许还包括同辈其他程璘曾孙,都参与了《洺水集》的重新辑注与再刊。《世谱》记载程璘曾孙辈六人,除程岷外,其他人或有字号、子嗣可记,或有官职、交游可书,而《世谱》分格记载诸人小传,位置有限,故未一一赘书其参与编集文集事。独程岷既无子嗣^①,又无官职,或因此但书编刻文集事系于传内。而程钜夫之文本为针对程景山一人的送序,《〔弘治〕休宁志》亦将此篇置于送序之中,与书序有所区别^②,未提及其他参与者也是可以理解的^③。

二、《洺水集》现存版本源流考述

程璘文集的宋元旧本已全部不存,今为学者熟知者有《程端明公洺水集》明刊本两种,其一为嘉靖刊二十六卷本,乃现存最早刻本;其二为崇祯刊三十卷本,后为《四库全书》本底本。该书现存版本看似并不复杂,实则其间源流关系尚存诸多疑点。像嘉靖本是否有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别、北大藏抄本的性质等关键问题既存研究皆付之阙如。至于王重民早已提出的崇祯本源于嘉靖本的判断,迄今也未得证实。这些问题都关涉到《洺水集》文献源流中的重要环节,下文将逐一进行探讨。

(一) 嘉靖初印本与北大藏抄本

嘉靖本《洺水集》分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半叶11行,行21字。前已述及,常见的嘉靖本卷一至卷二六卷端,往往有清除文字痕迹,以国家图书馆藏嘉靖本为例(索书号:09069,见图1),其中惟卷二四、二六删除未尽,还依稀保留有“……录刻”“裔孙梦龙录刻”字样,可借此窥知被清除的文字应是各卷录刻人题名。

①故《世谱》于程岷条末书“止”(《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卷四,叶一)。

②《〔弘治〕休宁志》此文前为马廷鸾《送曹清甫为考官序》,后为郑玉《送汪仲罕主簿序》(参见卷三二上《附文·人物序·送程梅亭序》,第682-683页)。

③吕午撰《行状》记载程璘之子、孙名字均与《世谱》吻合,唯记曾孙二人为通孙、振孙。《世谱》记程璘曾孙辈名皆山旁。通孙、振孙之名不见于《世谱》,亦不见于《新安名族志》。差异之由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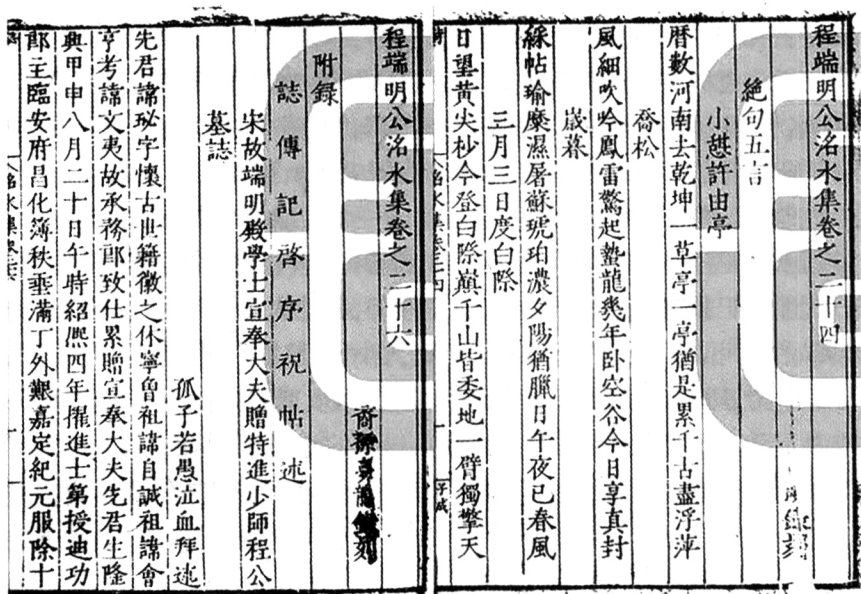


图1 国图藏嘉靖本(索书号 09069)卷二四、二六残存部分题名文字

这些题名可进一步从嘉靖本所附程元昉《书重刻端明公涪水集后》得到解释:

昔我端明公在宋……有《涪水集》六十卷、《内制类稿》十卷、《外制类稿》二十卷,曾孙教授公景山尝辑而刻之。元季兵燹,遗本鲜有得者,杂出于《新安文献志》及家乘仅数十篇……嘉靖乙卯春,族之预敦本约者咸曰:“表章先达,吾人志也。公集久湮,安所得梓?”太叔祖霄因其兄霖家藏录本出示,所存盖六十卷。金喜而阅之,间有残阙失次。昉乃与叔应元、以善,弟日升,侄梦龙更加辑定,以公历官岁月次其表疏,餘文则各以类相从,附公转官制诏及状、传诸外作,为卷二十有六。其内外制稿仅得《文献志》所载七篇,别附卷首……在约凡二十有六人,故卷因之分隶焉。^①

据此可知,嘉靖本编集的分工过程独具特点。就底本而言,该本主体来自程元昉的叔祖程霖家藏抄本。此抄本并不包括内外制《类稿》,仅有六十卷《涪水集》,且已“残阙失次”。现存嘉靖本有不少特征都显示这一抄本保留了一些宋代文献特征。例如正文遇“祖宗”“陛下”“朝廷”“圣慈”“睿旨”等词多前空一格,内文整体虽避宋讳不严,但保留了数处“贞观”改字避讳为“正观”

^①程元昉:《书重刻端明公涪水集后》,《程端明公涪水集》,嘉靖本,叶一至二。

等^①。就分卷而言,全书由参与“敦本约”的二十六位程氏后裔分工,以参与人数厘定卷数。具体来说是将程霖家藏抄本收录的表疏按照程秘的“历官岁月”依时序排次,其余文字则按照文体“以类相从”,此为卷一至卷二四。又因为内外制《类稿》已经亡佚,乃从《新安文献志》中辑得内外制七篇添作卷首。另外还搜罗到“转官制诏及状、传诸外作”作为附录,即嘉靖本卷二五、二六。国图藏嘉靖本卷二六残存的“裔孙梦龙录刻”,恰与《书后》中参与辑定的程元晒之“侄梦龙”相合,可推知被除去的人名当属于《书后》提及的二十六位程氏后裔。

上述细节提示我们,现存删去题名的刊本应当并非嘉靖本初印原貌。据《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著录,民国藏书家莫伯骥曾收藏有一种嘉靖本《洺水集》,其书“卷一题裔孙崇富录刻,卷二题裔孙霄录刻,以下各卷亦均有题记”^③。可见该本题名尚存,是初印本存在的重要证据。然而莫伯骥藏书大多在抗战中丧失,其著录实物之存亡已难考知^④。幸运的是,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初印本(典藏号:善845.25/785,见图2)^⑤,正可借此研究嘉靖本鲜为人知的原始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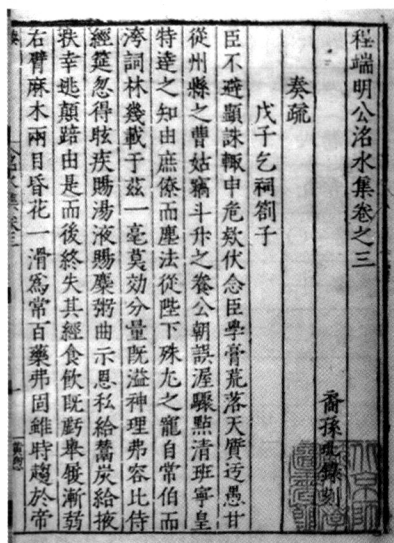


图2 北师大藏嘉靖初印本^②

①该本并未避讳“殷”“境”等原来可能在宋本中作缺笔避讳的字形,或经后人追改;作“正观”数处,分别参见程秘:《轮对札子(五)》《进故事》《讲义·易议》《重建方兴寺记》《致语·圣节》,《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四、六、十一、二一,嘉靖本,叶七、八、十二、十、三。

②书影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寒箫协助复制。

③莫伯骥著,曾貽芬整理:《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卷十七《集部三》,中华书局,2010年,第866页。

④曾貽芬:《整理说明》,莫伯骥著:《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第12页。

⑤是本钤有“苍岩山人书屋记”“无竞先生独志堂物”等朱文印,可知曾被明末清初梁清标、近代张其铨等收藏,另有“刘程字蓊云”白文印,未知何人,书前有题冬杲居士(钤“东皋”朱文印)题跋略述购书经历。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该本与后印本最显著的差别首先在于完整保留了卷一至卷二六的题名,整理如下表 1:

表 1 嘉靖初印本所见程氏后裔各卷分工题名

卷一	裔孙宗富录刻 ^①	卷一四	裔孙世遇录刻
卷二	裔孙霄录刻	卷一五	裔孙存吉录刻
卷三	裔孙玘录刻	卷一六	裔孙天产录刻
卷四	裔孙环录刻	卷一七	裔孙元昞录刻
卷五	裔孙大悦录刻	卷一八	裔孙益春录刻
卷六	裔孙启录刻	卷一九	裔孙元裕录刻
卷七	裔孙棫录刻	卷二〇	裔孙元成录刻
卷八	裔孙大淑录刻	卷二一	族裔孙日升录刻
卷九	裔孙楼录刻	卷二二	裔孙天宠录刻
卷一〇	裔孙廷珊录刻	卷二三	裔孙天辅录刻
卷一一	裔孙祖善录刻	卷二四	裔孙法政录刻
卷一二	裔孙应元录刻	卷二五	裔孙善绍录刻
卷一三	裔孙以善录刻	卷二六	裔孙梦龙录刻

其次,嘉靖后印本漫漶不清的文字也可借助初印本补足(参见后文表 2)。

此外,对比该印本与北大藏抄本,后者的来源问题亦可迎刃而解。北京大学古籍馆藏抄本《程端明公洛水集》目前可以在馆阅览胶卷(典藏号:SB/810.57/2613,见图 3)。是本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半叶 11 行,行 21 字。据北大图书馆著录,该本线装 6 册 1 函,纸高 25.5 厘米,其余物理形态未得目验。钤印有“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珍藏秘笈”“巴陵方氏功惠柳桥甫印”“方家书库”“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可知此本入藏北大前曾为清末藏书家方功惠旧藏^②。是本避清讳至“寧”字止,“竚”“淳”等字皆不避讳,或为道光朝抄本。此外,抄本每册书衣还有“四库著录本/巴陵方氏珍藏”楷书题识。

经比勘可知,北大藏抄本的分卷、篇目、行款、版式全同嘉靖本,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抄本卷一至卷二六卷端也保留了全部程氏后裔题记,只是将

①“宗富”,《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初编》误作“崇富”,第 866 页。

②笔者查阅国立北平图书馆传抄《碧琳琅馆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 4 册,商务印书馆,2005 年)及北大藏李盛铎旧藏《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典藏号 SB/012.7/0015a),均未著录此抄本。然方氏藏书目录生前未有定稿,有藏书或未著录亦在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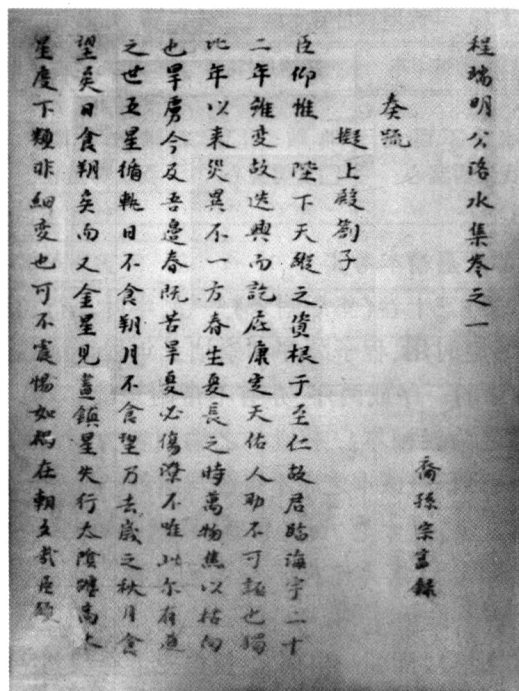


图3 北大藏抄本《程端明公洛水集》

“录刻”省略为“录”。另外，独存于嘉靖初印本的部分文字也见于该抄本（见表2），惟将“胡为乎日未靡旃”误抄为“胡为乎己未靡旃”。显然北大藏抄本的底本就是嘉靖初印本^①。

表2 嘉靖初印本与后印本、崇祯本文字对照表

出处	嘉靖初印本	嘉靖后印本	北大藏抄本	崇祯本
《易议》（其三）	其辞简而严， 虑是道之不行者	其辞简而严， □ ^② 是道之不行者	其辞简而严， 虑是道之不行者	其辞简而严， 忧是道之不行者
《行在重建都督府记》	稽功校劳，■■■■■	稽功校劳，■■■■■	稽功校劳，■■■■■	稽功校劳，剖竹分蕃
	胡为乎日未靡旃	胡为乎□未靡旃	胡为乎己未靡旃	胡为乎山未靡旃

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都图书馆藏有一部嘉靖后印本（书号：丙四4315），钐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方形白文印，知为近代吴引孙旧藏。其书各卷卷端有朱笔校记抄录程氏后裔题名，内文漫漶处亦有朱校补写。此类朱校内容多与嘉靖初印本相同，当据初印本抄补。

②□表示漫漶文字，■表示原有的墨钉及阙文。

续表

出处	嘉靖初印本	嘉靖后印本	北大藏抄本	崇祯本
《饶州明教禅寺重建应真阁记》	隳败不可支， 我发勇猛心	隳败 □□□， □发勇猛心	隳败不可支， 我发勇猛心	隳败六 ^① 已久， 因发勇猛心

(二)崇祯本源于嘉靖本考实

崇祯本《洺水集》三十卷《集后附录》一卷，半叶9行，行19字。是集前有崇祯二年(1629)赵时用、程子颐序和崇祯元年程至远序。不同印本或三序均有，或只有其中的一序或两序，亦有不带附录的印本，实则正文内容完全一致，本文均称之为崇祯本。崇祯本之编刻者为程秘后裔程至远，据其《重刻洺水文集小引》记载该本之底本来源与编刻经过云：

有《洺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熙朝一再刻之，仅得三十卷。万历戊申年山水暴涨，板为漂失。不肖远惧寝久而遂湮也，乃取旧本重订，寿诸剞劂。^②

所谓六十卷《洺水文集》“熙朝一再刻之，仅得三十卷”，其字面意思是指在程至远重订之前，明代已经刊刻过《洺水文集》，该本仅辑得六十卷文集之半^③。该三十卷本不见于公私著录，流传范围可能较为有限。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原三十卷本雕版遗失，时隔约二十年，程至远遂于崇祯元年二年间取原书校勘，重新翻刻，是为今崇祯本。崇祯本遇“祖宗”“陛下”“朝廷”“圣慈”“睿旨”等字时往往亦前空一格，避讳情况也与前文所述嘉靖本类似。仅从这两种特征来看，崇祯本依据的明刊三十卷本似乎给人一种渊源于宋本的印象。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先看嘉靖本与崇祯本的卷目编次结构异同，列表3如下：

①此处“六”应为“亦”字之形讹。

②程至远：《重刻洺水文集小引》，《程端明公洺水集》，崇祯本，叶三至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NC/5366/2113，本文引用崇祯本均据此本。

③祝尚书先生曾据此认为“所谓‘一再刻’，或指修补嘉靖板，或嘉靖后、崇祯前别有刻本，今不详”（《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卷二四，第1239页），然嘉靖刊本仅二十六卷，并非“仅得三十卷”。“一再刻之”指修补嘉靖刊本的可能性或较小。

表3 嘉靖本与崇祯本卷目对照表^①

嘉靖本卷目		崇祯本卷目	
卷之首	辞命	卷一	制诰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奏疏		
	表笺	卷三	表笺
卷四	议附进故事	卷四	议附进故事
卷五	策问	卷五	策问
卷六	策问		
	讲义	卷六	讲义
卷七	讲义		
卷八	记	卷七	记
卷九	记		
卷一〇	记		
卷一一	记		
卷一二	序	卷八	序
卷一三	题跋	卷九	题跋
卷一四	墓志	卷十	墓志
卷一五	行状	卷一一	行状
卷一六	祭文哀辞	卷一二	祭文哀辞
卷一七	书	卷一三	书
	尺牍	卷一四	尺牍
卷一八	尺牍		
卷一九	启	卷一五	启
卷二〇	启		

^①崇祯本书前总目与正文实际卷目偶有出入,本表依据实际卷目编次,并于括号中注明书前总目异文。

续表

嘉靖本卷目		崇祯本卷目	
卷二一	致语	卷一六	致语
	祝版	卷一七	祝版青词
	青词		
	疏	卷一八	桥疏(书前总目作“疏”)
	上梁文	卷一九	上梁文劝农文 (书前总目合并作“文”)
	劝农文		
	桥疏		
卷二二	说	卷二〇	赋
	铭	卷二一	拟古诗(书前总目作“拟古”)
	赞	卷二二	五言古
	赋	卷二三	七言古
卷二三	拟古诗	卷二四	五言律
	古诗五言	卷二五	七言律
	古诗七言	卷二六	五言绝句
	律诗五言	卷二七	七言绝句
	律诗七言	卷二八	说
卷二四	绝句五言	卷二九	赞铭
	绝句七言		
	乐府	卷三〇	乐府
卷二五	附录制诏状	附录	制诏状志传记启序帖
卷二六	附录志传记启序祝帖述		

由上表可见,崇祯本卷目分类及排次顺序基本与嘉靖本相同。据前文所述,嘉靖本的卷目次序乃程元炳等人面对“残缺失次”的抄本重新依据文体分类而成,但号称别有来源的崇祯本卷目也恰与之相似,恐非巧合。而两本之间最大的差异,则是崇祯本编者在正文部分将嘉靖本卷二二《说》移到了卷二八,又将同卷之《赞》《铭》置于卷二九。至于《说》《铭》《赞》分别所录文章的篇目与次序,崇祯本则雷同于嘉靖本,甚至嘉靖本卷二二《郊祀天光赞》题注“首缺二行”,崇祯本亦仍其旧^①。可见,崇祯本对嘉靖本卷二二的调

^①《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二《郊祀天光赞》,嘉靖本,叶九;《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九《郊祀天光赞》,崇祯本,叶二。

整,不过是将《说》《铭》《赞》三部分进行整体移易。

再看嘉靖本与崇祯本的篇目编次。限于篇幅,在此仅选取两处关键细节说明。其一,嘉靖本在卷二一将《桥疏》(仅存一篇《汪复求东甲桥疏》)与其他宗教性文字《疏》分作两个小题区分,但在正文中误将赠序《赠范甥可起》编入《桥疏》小题下。崇祯本的编者则于书前总目中将《桥疏》与其他疏类文字合并作卷十八《疏》,然在该卷正文中,却将《汪复求东甲桥疏》与嘉靖本误收在此篇后的《赠范甥可起》,连带小题《桥疏》整体移到卷十八之首。《赠范甥可起》下又紧接其他宗教性疏文,不做区分。这不但延续了嘉靖本的错误,还造成了新的误会,仿佛卷十八的其他疏类文字均属于《桥疏》小题之下^①。其二,前引程元昉《书后》述及嘉靖本卷首《辞命》与卷二五、二六之《附录》,均为当时编者重辑,乃该本新创。然崇祯本卷一《制造》与《集后附录》所录篇章,除脱去《内翰祠祝文》与《祠墓首末》两文外,其余篇目次序正与嘉靖本完全一致。以上二例皆可见崇祯本据以重刻的三十卷本渊源于嘉靖本之迹。

除了卷次、篇目,从异文入手还能进一步帮助说明两个版本的关系。有学者已指出崇祯本校勘远逊于嘉靖本^②,而在文字正误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凡嘉靖本原作墨钉或嘉靖后印本漫漶不清处,崇祯本于对应处多有补写(可参见前文表2)。例如,《行在重建都督府记》,嘉靖本“稽功校劳”句下作四字墨钉,崇祯本补作“剖竹分蕃”;《饶州明教禅寺重建应真阁记》,嘉靖初印本作“隳败不可支,我发勇猛心”,后印本“不”至“我”字漫漶,崇祯本补作“隳败亦已久,因发勇猛心”;《易议》(其三),嘉靖初印本作“虑是道之不行者”,后印本“虑”字漫漶,崇祯本补作“忧”。这类文本至少揭示了两个问题:其一,崇祯本在整体上因袭嘉靖本之余,对少数文字有所校补,但这一校勘过程并不彻底,似乎只局限于尽量补足嘉靖本残缺之处;其二,崇祯本祖述之嘉靖本很可能是后印本,所以无从照录后印本漫漶文字。至于这些校补异文究竟是崇祯本据以重刻的明刊三十卷本所校补,抑或是崇祯本编者程至远“重订”的产物,文献不足,今已不得而知。

综合以上考证,还可重新检讨前引程至远《小引》所称“有《洛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熙朝一再刻之,仅得三十卷”,可知此所谓三十卷本(即崇祯本底本)正如王重民先生推论,并非较六十卷本文集阙佚其半,与嘉靖本

①《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二一《桥疏》,嘉靖本,叶十八。《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一八《疏》,崇祯本,叶一至二。

②崇祯本文字之误,可参见黄宽重指出的文渊阁四库本《洛水集》“改正明崇祯刊本失误”段(《程秘与〈洛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58-159页)。

实为一系。这也能说明所谓“熙朝一再刻之”应当是指嘉靖本与因袭自该本的三十卷本两种。盖程至远当日取三十卷本重刻,颇有以此彰显声名的意味。例如崇祯本在每卷卷端后除题程秘衔名外,大书“裔孙至远迩行重订”。而嘉靖本的卷帙与参与“敦本约”的二十六人密不可分,程至远《小引》最后仅称“熙朝一再刻之”就将此前编刻情况约略带过,或许有些隐没前人功绩,突出自身成就的意味。

三、《四库全书》诸阁本《洺水集》校勘价值管议

《四库全书》本《洺水集》现存文溯阁、文津阁全本以及文澜阁本卷一五、卷二四至末^①,文溯阁本未见。既有研究集中于文溯阁本,以黄宽重所论最为详尽。黄氏指出该本除了蓄意删窜涉及民族意识之处和誊抄错误,也有校勘优点。进而推测四库馆臣在编纂时有不少相关版本可资参考,因此能改正明刊本的一些谬误与缺失^②。这一观点还得到了王曾瑜的认同^③。而在古籍整理方面,《全宋文》在收录程秘文章时,除以嘉靖本为底本外,即以文溯阁本为校本,或许也是考虑到此本具有相当的参校价值。然而文溯阁本形成较晚,在承认其校勘优点之前,更应具体探讨其校勘依据。此外,其余诸阁本的情况也应该尽可能综合考虑。

从《洺水集》流传脉络而论,前已述及该书宋元旧本在明代已非常罕见,清代四库馆臣获得这类旧本的难度应当更大。实际上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当日四库馆采进的《洺水集》版本仍以两种明代刻本为主,即嘉靖刊二十六卷本与崇祯刊三十卷本^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洺水集》三十卷,“乃崇祯

①文澜阁本残存与补抄情况参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73页。

②黄宽重:《程秘与〈洺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0-183页。

③王曾瑜:《治辽宋金史杂谈》,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收入《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④关于嘉靖刊二十六卷本,《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著录为“《洺水集》二十六卷,宋程秘著,四本”(吴慰祖整理:《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94页);《浙江采进遗书总录·壬集》亦著录有“《洺水集》二十六卷,刊本”(沈初等撰,杜泽逊、何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1页);《江苏采辑遗书目录·集部》著录《洺水集》为“制稿七篇、文二十二卷、诗词二卷、附录二卷,共二十六卷,刊本”,惟将作者误写作“端明殿学士莆田郑泌”(黄烈编,收入张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2006年,第393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四库采进嘉靖本实物(索书号:09069),其书钤有朱文长方印“乾隆三十八年 月 计书”、满汉朱文“翰林院印”。关于崇祯刊三十卷本,《四库全书》(转下页)

乙[己]已其裔孙至远所刻”^①。核验文渊阁、文津阁《洛水集》均为三十卷,又据书目著录,文澜阁、文溯阁卷数亦为三十卷^②,并无抽换。是诸阁底本当皆为崇祯本。至于嘉靖本虽然也曾经采进,但从文渊阁和文津阁的篇目来看,该本未被吸收入《四库全书》系统。崇祯本较嘉靖本脱去十七篇文字^③,其中如《休宁县重建大成殿记》《吕主簿诗序》《祭汪侍郎》等文,大多并无违碍以致需要全篇删去,四库馆臣当时倘能取嘉靖本校勘,断应补足。而文渊阁和文津阁本的篇目却全同收文较寡的崇祯本。可见校理者乃径取崇祯本为底本,连两种明代刊本的篇目多寡都未仔细比对,更遑论逐字对校。

就文字校勘而言,文渊阁、文津阁本的改动大多出于理校,其中不乏误读错改原文之处,尤其以前人推崇之文渊阁本误改为多,略举数例如下。

(1)文渊阁本卷三《谢历日表》“万寿叨陪于虎拜”,“叨”,文津阁本作“欣”。而嘉靖本作“莫”,崇祯本作“萬”。按,“莫陪虎拜”之语为宋人习用,往往表示地方官员无法恭临朝中朝拜天子,恰与本文“右掖左冯,独望尧云之近;东宾西饯,首颂汉历之新”相合,推测和程秘以右司郎官兼任江东运判

(接上页)初次进呈存目》所著录三十卷本即崇祯初“裔孙至远所刻”(江庆柏等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75页);二次进呈稿本《四库全书总目》亦著录此本(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一六二《集部·别集类十五》,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抄本,2011年,第61-62页)。惟《江苏省第一次书目》仅著录“《洛水集》,四本”(《四库采进书目》,第12页),难以确证其刊刻时代与卷数。

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洛水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册,影印武英殿本,第285页。按,祝尚书先生已指出崇祯无乙巳年,当为“己巳”之误(《宋人别集叙录(增订本)》,第1239页)。检《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375页)、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23页)尚作“己巳”不误;二次进呈稿本《总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一六二,第62页)、文津阁本书前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8页)、浙本《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浙江书局本,1965年,第1390页)以及殿本《总目》均误抄作“乙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殿本《总目》著录此书来源为“江苏巡抚采进本”,二次进呈稿本《总目》同(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一六二,第61页),前者当源于后者。惟浙本《总目》作“江西巡抚采进本”(第1390页),其间差异之由待考。

②文澜阁本参考《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见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52页;文溯阁本参见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第3110-3111页。

③黄宽重比对崇祯本较嘉靖本缺少十六篇文字(《程秘与〈洛水集〉研究》,《南宋史研究集》,第149-154页),然崇祯本卷十《吴范二姊墓志铭》有目无文,故知实缺十七篇。

有关。嘉靖本作“莫”不误，崇祯本形讹作“萬”，文渊阁、文津阁改为“叨陪”“欣陪”皆失本义^①。

(2)文渊阁本卷三《天基圣节贺皇太后表》“所以燕及天心而无已”，“及”，文津阁本作“麗”。按，此字崇祯本误作“鹿”，文义不通，故文渊、文津二阁均改底本。然嘉靖本原作“享”，本不误，文渊阁、文津阁本所改未能体现程秘文字旧貌^②。

(3)文渊阁本卷二《戊子内引札子》“而臣频岁以及今春，忧患沓至，恳祈闲退，期弭馀菑，而天灾流行，至于四五”，“天灾”，嘉靖本、崇祯本、文津阁本作“天眷”。按，程秘原表乃自述他屡次乞退而不获，以致天降忧患，但皇帝仍然多次眷顾不允。文渊阁本盖承上文“馀菑”云云臆改下文“天眷”为“天灾”^③。

(4)文渊阁本卷七《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记》“宗正赵氏名师贡，盖崇宪靖王之子，今官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云。丞名范，盖端明殿学士讳方之子也”。嘉靖本、崇祯本、文津阁本此句“赵氏”二字均在“丞”字下。按，宋代南班宗室不书姓，赵师贡官至节度使，故程秘仅称“名师贡”，而赵范非宗室，故称“赵氏名范”。文渊阁本明显属于四库馆臣臆改，反失宋人之意^④。

至于黄宽重所举文渊阁本文义优胜之处，或者文义两可，例如卷二《缴进耕织图札子》“臣今已装背成帙，谨以进呈”，“帙”，两种明刊本均作“秩”，文渊阁本不过将其改作通用字^⑤。或者可据常识理校，不一定需要参校其他版本，如卷一《太师鄂王岳飞改谥忠穆制》“伟烈士之英风，将千秋而发竖”，

①《洺水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55页。《洺水集》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93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三，嘉靖本，叶十。《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三，崇祯本，叶十。

②《洺水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51页。《洺水集》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489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三，嘉靖本，叶八。《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三，崇祯本，叶一。

③《洺水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47页。《洺水集》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485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三，嘉靖本，叶四。《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崇祯本，叶四六。

④《洺水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303页。《洺水集》卷七，《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537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八，嘉靖本，叶二。《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七，崇祯本，叶二至三。

⑤《洺水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49页。《洺水集》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487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嘉靖本，叶十三。《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二，崇祯本，叶五十。

“竖”,两种明刊本均作“坚”,显为形近而误^①。又如文渊阁、文津阁本往往将明本之“唯”改作“惟”,“属”改作“嘱”,如此改写之例甚多,亦不必参考他本。总而言之,这些校勘均不可视作有版本依据。

如何评估四库各阁本的校勘价值直接影响了今人对程秘文章的整理。例如《全宋文》程秘部分就大量吸收了文渊阁本的理校,前举四条清人误校之处,《全宋文》皆据文渊阁本误改嘉靖本,殊为失当^②。甚至《全宋文》中一些文章还出现了因袭文渊阁本蓄意删窜涉及民族意识之处,不禁让人怀疑此部分内容是否暗以文渊阁本为底本^③。这些疏失或许都是因为未能正确评估四库各阁本的校勘价值,值得引起学界重视。

四、结语

本文对程秘《洺水集》的编集始末与版本流传重加考证,力图推进学界对这部文集的文献学认识。就宋元时期的编刻过程而论,程秘生前已将其文集编集成九十卷,但并未刊刻。其初刻应在程秘身后至咸淳三年以前,在宋季流传范围已相当有限。宋元鼎革之际,程秘文集或因兵燹经历散佚,元初,其曾孙辈程岷、程岷等对《洺水集》重加搜讨、编注,刊行于世,此为该书之再刊本。程钜夫所获即为此本,得书时间大约在至元二十三年后程氏奉诏“搜贤江南”期间。而就现存诸本《洺水集》的源流而论,嘉靖本《洺水集》尚有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别,前者完整保留了录刻人题名与后印本漫漶不清的文字。向为人忽视的北大藏清抄本就来源于初印本,而作为《四库全书》底本的崇祯本则源于后印本。可见嘉靖本《洺水集》的初、后印本在该书前后传承中处于不同节点,其文献影响力亦不尽相同。这一发现不但有助于《洺水集》的校勘整理,也展现了这部宋集更为完整丰富的流传图景。至于四库各阁本的校勘价值,从文渊阁和文津阁本来看,其校改并非别有版本依据,其实皆为理校,间有误改,价值不宜高估。为便于理解,附录《洺水集》版本源流图于文末(见图4)。因文献不足,部分流传过程尚有阙环,以虚线箭

①《洺水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226页。《程端明公洺水集》卷首,嘉靖本,叶三。《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一,崇祯本,叶三。

②程秘:《戊子内引札子》《天基圣节贺皇太后表》《谢历日表》《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七七七、六七七八、六七九〇,第297、29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1、280、283、72页。

③例如《全宋文》所录《四明高氏春秋解后序》“乱臣贼子,接迹海内,荆楚强暴,凭陵中国”(《全宋文》卷六七八四,第297册,第371页)、“荆楚”,文渊阁本同,嘉靖本、崇祯本作“戎狄”。

头表示,括号内书名则指现已亡佚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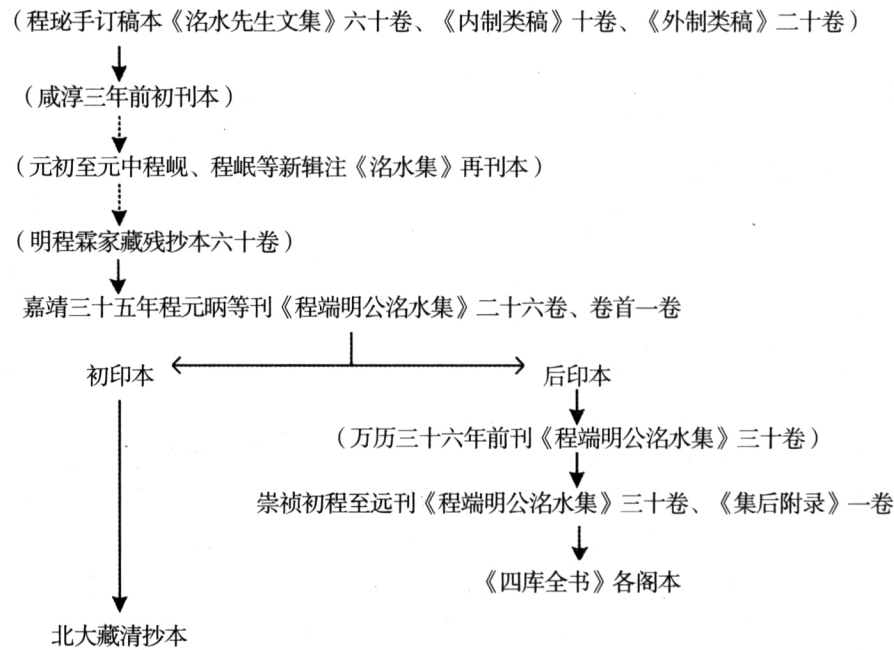


图4 《洺水集》版本源流图

拙文初稿为2019年秋北京大学王岚老师所设“宋人别集编刻研究”课程报告。写作过程中,多承苗润博老师批改,复蒙邓小南、张帆老师指点,学友李寒箫、秦光永、李飞、张鹤天、郭洋辰、吴同、姜伊等先后提供资料或修订意见,又经匿名审稿人匡正。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徐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